

关陇文人薪火传承论

李 强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摘 要:关陇系指陕西中部的关中与甘肃东部的陇右地区,这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国北方文人学者最为集中、其著述最为繁复之地。自古以来,中国的儒教、道教与西方传入的佛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在这里汇流,形成了源远流长的长安文化,其中以关学为代表的北方理学流派,与程朱理学并驾齐驱,成为全国最富有影响的华夏哲学、思想、宗教、文学、艺术等学术群落。对关陇文人的身世与作品进行全面、深入、科学的发掘、整理与研究,将有力地促进中国西部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关键词:关中;陇右;关学;长安学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2)03-0009-11

翻阅陕西乃至西北诸省的历史,因为地理上的密切关系,总会或多或少地涉及到关中、陇右与关陇等地名与各种文化流派。这里是中华民族原始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故有着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特色,又因为从此地产生了有着世界意义的“丝绸之路文化”,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向着国内外延伸,自北宋以张载为代表所创立的“关学”及其受此影响而形成的相关哲学、文学、艺术名士群落,为中国西部的经济文化做出许多贡献,对此领域历史文化的发掘与整理,对建立西安文化国际大都市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关中、陇右关学与张载

关中:古地区名。在秦、汉两代所指范围大小不一。《史记·货殖列传》:“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汉书·地理志》改作“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泛指自函谷关以西战国末秦故地,包括秦岭以

南的汉中、巴蜀在内。但一般说法并不包括秦岭以南,故项羽、刘邦相约先入关的做关中王,后来项羽封先入关的刘邦于关中,并诡称:“巴、蜀亦关中地也。”而另将关中之地分封秦三降将,以拒刘邦。这又指秦岭以北范围内。又时或包括陇西、陕北,如项羽三分关中封秦降将,其中翟王在陕北,雍王即辖有陇西,时或专指今陕西关中盆地。《史记·货殖列传》:“关中自汧雍东至河华。”或将关中解释作居众关之中,如潘岳《关中记》以为“东自函关,西至陇关”;《三辅旧事》以为“西以散关为限,东以函关为界”;徐广以为“东函关,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胡三省注《资治通鉴》:“西有陇关,东有函关,南有武关,北有临晋关,西南有散关。”这些都是后起之说。

陇右:此称谓与地理方位密切相关。据《水经注》记载:“洮水在城西,东北下,又北,陇水注之。水出鸟鼠山西北高城岭,西迳陇底。”由此可知,“陇右”或“陇西”来自“陇水”之西,得名于今甘肃省渭

收稿日期:2012-07-11

基金项目:教育部“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作者简介:李 强(1950-),男,甘肃兰州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源县境“鸟鼠山”西北“高城岭”的“陇底”。其中即有“陇右”。胡三省为《资治通鉴·唐纪》“陇右”注曰:“秦、渭、河、鄯、兰、阶、洮、岷、廓、迭、宕、凉、瓜、沙、甘、肃为陇右道。”根据此书与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对照印证:陇右道版图宏大,包括秦州、渭州、武州、兰州、河州、鄯州、芳州、洮州、岷州、临州、廓州、迭州、宕州、凉州、瓜州、沙州、甘州、肃州、伊州、庭州、西州等地,地域甚为辽阔。

查询其“陇右”最早约出现于汉末魏初,但溯其渊源,此称谓则由陕甘界山的陇山(六盘山)而来。古人以西为右,故称陇山以西为陇右。古时也称陇西。唐代开创了中国政区史上道和府的建制。唐太宗贞观元年(627)以全国山川形貌将全国划分为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等十道。开元年间又将山南、江南各分东西,并增置京畿、都畿、黔中道,形成十五道的格局。道下又设州。以东起陇山,西达沙洲的地域始设陇右道,其地域包括今甘肃、新疆大部分地区和青海湖以东地区。唐睿宗景云二年,以黄河为界东设陇右道,西设河西道。至此,“陇右”作为地域范围,就有了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陇右等同于“十道”时期的陇右道辖域,狭义的陇右指今甘肃省黄河以东、青海省青海湖以东至陇山的地区。陇山以东的平凉、庆阳二市,习称陇东,就其隶属关系和历史文化传统而言,与陇右地区颇多相似,故也属“陇右”。

《资治通鉴》记载“天下富庶者无如陇右”。陇右地区位处黄土高原西部,界于青藏、内蒙、黄土三大高原结合部,自然条件独特;历史上无论是政区划分、民族分布、人口构成还是经济形态、民风民俗,均有较多联系和相似之处,是一个相对完整的自然、人文地域单元。此区域既是历史上中西文化与商贸交流的通道——“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又是历代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统域西北边防的前沿地带。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孕育并由当地各族人民创造、传承与关中文化相连又相对应的陇右文化,就其渊源之久远、成分之复杂、内涵之丰富、特色之鲜明、作用之独特、地位之重要而言,是同其他地域文化齐名的又一典型地域文化。

于陇右之右,关中之中的古代长安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自元明以后因都市的迁置,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东渐及南移,而渐渐淡出了权贵的视线,沿用了多年的旧名也被西安新称所替代。但是它作为中国腹地中心城市、南北交通枢纽,特别是中国西北和西部地区的桥头堡,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传统文化

辐射作用。

王晶波在《晋唐陇右小说》中论证:“陇右,地处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过渡地带,横贯全境的丝绸之路,是汉唐中外文化交流的最重要通道,自古以来又聚居往来着众多的民族,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造就出一种宽容开放的文化氛围和求新尚奇的民俗风气,为文学艺术,尤其是小说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在晋唐小说的发展过程中,陇籍作家做出了值得骄傲的贡献,这一时期陇右小说的创作,不仅构成并且推动了志怪传奇的发展繁荣,而且也形成了一种值得研究的地域文化现象。”^[1]

在周秦时期关中地区诞生的天圆地方、天人合一的普世文化观念始终指导着华夏民族的思维,汉唐时期培育的极度繁荣的文学艺术作品和它们才华横溢的作者一直闪烁在中华民族璀璨的文艺天空。于长安古城与关中地区酝酿产生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代表流派——关学,薪火传递至今,成为极其珍贵的中华民族文化遗产。

所谓“关学”即关中(函谷关以西、大散关以东,古代称关中)之学,这是从地域角度而言的术语,无论是张载之前的申颜、侯可,还是张载之后的吕大钧兄弟、李复、范育、游师雄、种师道以及金元明清时期的杨奂、杨恭懿祖孙三代、吕柟、冯从吾、李二曲、李因笃、李雪木、刘古愚等都是关中人,故其理学又称为“关学”。关学,是萌芽于北宋庆历之际的儒家学者申颜、侯可,至张载而正式创立的一个理学学派。因其实际创始人张载世称“横渠先生”,因此又有“横渠之学”的说法。

张载(1020~1077),字子厚,《宋史·张载传》称他为长安(今陕西西安)人,一生殚精极虑、刻苦励学,其为学主旨:“每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如圣人尔后已。以为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人而不求为圣人,此秦汉以来学者大蔽也。故其学尊礼贵德、乐天安命,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黜怪妄,辨鬼神。”

张载创立关学之初,关中学子便积极追随,其中以蓝田吕氏兄弟最为踊跃。张载开始在关中讲学时,首和者就是吕大钧,接着其兄吕大忠、其弟吕大临都相继拜张载为师。蓝田吕氏兄弟五人登科及第,是闻名遐迩的名门望族,他们的加入至关重要,为关学发展奠定了政治和经济基础,使关学与二程“洛学”、王安石“新学”形成鼎立之势。

据刘宗贤著《理学要义》评述:张载在晚年时其“学问愈精深,学习态度也更加刻苦。其弟子在为

他作的行状中这样记述:‘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座,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始须臾忘也。’张载的不断创新和不断思考的精神使他学思并进,德智日新。”^[2]

明朝以理学开国,使儒家书籍遍及天下,为关学振兴开辟了一条坦途。据有关史籍记载,在明代中后期,关中的理学家竟达百人之多,其中成就最大的是吕柟。他与统治了百年的“阳明学”对衡,而盛赞张载、二程和朱熹的学说。晚年吕柟辞官回乡,建立书院,培养学生,著书立说,撰有《四书因问》、《宋四子抄释》、《周易说翼》、《礼问》、《泾野先生文集》等,成为张载之后的关学大学者。另外,还有一位学者是冯从吾。他本来在朝做官,因对宦臣魏党极为不满而回到家乡,二十六载闭门著书,著有《关学篇》、《凝思录》、《辨学录》等,为弘扬关学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张载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和辩证法思想,他的“太虚即气”和“一物两体”学说就是见证。他一反“二程”以“理”为万物本源的说法,而把“气”作为万物的本源。他认为由于气的聚散和变化形成了客观世界的各种物质现象,气聚拢时而为万物,气散开时就成为无形的“太虚”。他认为气分阴阳两端,即事物都有对立的两个方面,两个方面的矛盾斗争形成了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运动。他把矛盾运动称为“参”。其“两端一参”论,是他和“二程”学说的最大区别;再比如他的“地球中心”学说,他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本身有自转,由太阳、月亮和其他五颗星球组成的七曜,与地球同时向左旋转,只是因为转速不同而形成了在地面上看,有左旋、右旋。这样的科学观点在当时是非常先进和可贵的,有着朴素辩证思维。

张载的思想具有鲜明的独创性。他的“天人合一”、“民胞物与”思想,不仅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反映了他视民如同胞的平等原则。这样的思想在张载之前是没有人提出过,故其思想显得格外珍贵;他还主张恢复井田制,认为井田制可以使百姓贫富均匀,丰衣足食;他主张爱护天下所有的人和物,不要贪婪,不许霸占。这无疑是继承并发展了儒家“仁民爱物”的观点。张载治学严谨、务实,主张科学性。他提出并主张的“学必为圣”、“经世致用”、“笃行践履”都有着明确的指向。他反对空知不行、学而不用;始终坚持高度关注国家、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积极参与社会的变革,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关

学的学问,并且引领着关学学者的学术实践。冯友兰先生评价说,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概括了关学哲学家的最高思想境界。

二、关学流派中的知名人物

在北宋理学大师张载创立了关学思想流派之后数百年,在关陇地区及周边地区其学派薪火源源不断,并相继涌现了不少名彪千古的代表人物。诸如吕大钧、吕大忠、吕大临、李复、范育、张舜民、游师雄、种师道、薛昌、杨奂、杨恭懿、杨天德、杨寅、马理、吕柟、韩邦奇、冯从吾、李二曲、李因笃、李柏、李雪木、刘古愚等。

吕大钧(1029~1080),字和叔,吕大忠二弟,今陕西蓝田县人,吕大钧出身在一个书香门第之家,他从小就胆识过人,文才兼备。北宋嘉佑二年(1059)中进士,被授予秦州(今甘肃天水)司里参军,后任延州(今陕西延安)监折博务、三原知县、后供(今福建福州)知县等职。后辞官回到蓝田,开始传授张载学说,以“教化人才,变化风俗”为己任。经过吕大钧多年努力,“关中风俗为之一变”。元丰年间(1078~1080),时值宋朝用兵西夏,吕大钧是富弼(今陕西富县至延安一带)转运司副使。吕大钧在任上病逝,时年 52 岁。吕大钧主要著作有《四书注》、《诚德集》等。

吕大忠(生卒年不详),字进伯。京兆蓝田人。其先汲郡(河南卫辉)人。祖吕通,太常博士。父吕蕡简,比部郎中。与弟吕大防、吕大钧、吕大临,称“蓝田吕氏四贤”。程颐称:“吕进伯可爱,老而好学,理会直是到底。”皇佑进士,初为陕西华阴县尉,后任山西晋城县令。升秘书丞,兼任定国军的军事判官。迁河北转运判官、陕西转运副使,官至宝文阁直学士,元祐二年(1087),任陕西运转副使期间,将《石台孝经》、《开成石经》及碑石移至西安碑林。晚年与章敦等不合,徙知同州(今陕西大荔县)。又降待制,后致仕,不久卒。著有辑川集 5 卷及奏议卷。

吕大临(1044~1091),字与叔,京兆蓝田(今陕西蓝田县)人。其先汲郡人,迁居京兆蓝田。祖吕通,太常博士。宋代金石学家。曾学于程颐,与游酢、杨时、谢良佐并称程门四先生。元祐中,为太学博士,迁秘书省正字。后范祖禹荐其充任讲官,未及用而卒。吕通六经,尤精于礼,与兄大防等同居时即切磋古礼,自谓所施冠昏丧祭诸礼一本于古,当时有

“关中言礼学者推吕氏”之称。著有《考古图》10卷,《易章句》、《大学说》、《中庸说》各1卷,《礼记传》16卷,《论语解》10卷,《孟子讲义》14卷,《玉溪先生集》28卷。又与其兄大防合著《家祭仪》1卷。

李复,字履中,先世家开封祥符,后徙长安。生卒年均不详,元祐末(1093)前后在世。登元丰二年(1079)进士。绍圣间,为西边使者。喜言兵,于书无所不窥,尤工诗。学者称为潏水先生。历官熙河转运使,至中大夫集贤殿修撰。后知秦州,死于金寇。复著有潏水集16卷,《四库总目》传于世。清四库馆据《永乐大典》辑为16卷,其中诗8卷。事见《潏水集》附录宋钱端礼撰《书潏水集后》及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一四,《宋元学案》卷三一有传。

张舜民,北宋文学家、画家。字芸叟,自号浮休居士,邠州(今陕西彬县)人。生卒年不详。英宗治平二年(1065)进士,为襄乐令。元丰中,环庆帅高遵裕辟掌机密文字。元初做过监察御史。张舜民的词作与苏轼风格相近,所以有的作品被人误为苏词。宋人周紫芝《书张舜民集后》云:“世所歌东坡南迁词,‘回首夕阳红尽处,应是长安’二语,乃舜民过岳阳楼作。”张舜民生平爱画,且题评精确。虽南迁羁旅中,所经各地也必搜访题识。东南各处士大夫家所藏名作,全被载录。亦能自作山水。其文集今存《画墁集》8卷,补遗1卷,有《知不足斋丛书》本及《丛书集成》本。

游师雄(1037~1097),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人,字景叔,宋治平元年(1064)中进士,授仪州司户参军。熙宁四年(1071)改任德顺军判官,与诸将计议边事,多所建树,使边境赖以无患。绍圣元年(1094),游师雄又为哲宗皇帝策划御敌要略六十条(一作十六条),当时谓之《绍圣安边策》。绍圣二年(1095),再调河中知府,不日又晋升为直龙图阁兼秦州知府,领秦凤路马步军都总管加飞骑尉等职。绍圣四年(1097)秋,调为陕州知府,是年病故,终年60岁,归葬武功。

种师道(1051~1126),北宋名将。原名建中,又名师极,字彝叔。洛阳(今属河南)人。初以荫补官,历熙州推官、原州通判、提举秦凤常平。政和六年(1116),擢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知渭州。宣和元年(1119)初,奉徽宗命率军修筑席苇平城(后改为静夏城,今甘肃平凉境),城未就而夏军骤至,乃列阵葫芦河(今宁夏清水河)畔,佯欲决战,暗遣军出夏军后,扬言宋援军至,乘其犹疑之机,前后夹击,

大败夏军。六月,再破夏军于藏底城(今陕西志丹北),升侍卫亲军马军副都指挥使。

杨奂(1186~1255)又名知章,字焕然,乾州奉天人。生于金世宗大定二十六年,卒于元宪宗五年。早丧母,哀毁如成人。金末,尝作万言策,指陈时病,欲上不果。元初,隐居为教授,学者称为紫阳先生。耶律楚材荐为河南廉访使,约束一以简易。在官十年请老。卒,谥文宪。著述甚丰,有还山前集81卷,后集20卷,近鉴30卷,韩子10卷,槩言25篇,砚纂8卷,北见记3卷,正统纪60卷等传于世。

马理(1474~1556),字伯循,号溪田,三原(今陕西三原县)人。弘治十年举人,正德年间考取进士。先后任吏部稽勋司主事、员外郎、考功郎中、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南京光禄卿等职。1556年,陕西发生大地震,马理卒,时年82岁。马理年幼聪明好学,举止文雅,14岁时就成为当地很有名的诸生,20岁和王端毅一起步入仕途。后因康僖公保举,以进士身份回到家乡,在弘道书院开始讲学。其间博览群书和儒家经典。他在讲学中注重言行如一,时时处处仿效古代圣贤,很有关学宗师张载的风范,深受名士康僖公的器重。马理为官时,曾多次直面劝谏武宗、世宗,多次遭廷杖处罚,并获罪入狱,但他仍以国家大事为己任,从不顾个人安危。他十分注重培养新人。70岁时归隐商山书院,前来索求诗文的人很多。他经常着山乡贫民的服装,鹤发童颜。马理在礼仪方面拜师张载,但在学术上更接近程、朱,见解独到。著作有《四书注疏》、《周易赞义》、《尚书疏义》、《诗经删义》、《周礼注解》、《春秋修义》、《陕西通志》等。弘治年间就学三原宏道书院,其学识和文章闻名全国,当时学者都将他与宋代著名哲学家、关中学派代表人物张载相提并论。所著《送康太史奉母还关中序》一文,被传抄国外,朝鲜国将此文作范文传诵。

吕柟(1479~1542),字仲木,号泾野,今陕西高陵县人。吕柟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吕薄“有隐德”而不仕,而幼年的吕柟则“志大好学”,寒身酷暑,整日读书于他的矮屋之中。14岁应重试补廪生,后因乡试不第入太学。明正德三年(1508)以殿试第一而中状元。吕柟中状元后,先后任翰林院修撰,充任经筵讲官、考官、史官等职。明世宗即位后,又参与撰修《武宗实录》,后遭诬陷被贬解州(今山西解县)和南都(南京)国子监祭酒、礼部右侍郎等职。吕柟的著述甚多,主要有《四书因问》、《尚书说要》、《周易说翼》、《春秋说志》、《宋四子抄释》、《诗集》、《迢

野文集》、《高陵志》、《解州志》等。

韩邦奇(1479~1556),字汝节,号苑洛,为今陕西大荔县人。韩邦奇出生在一个宦宦家庭,他的父亲韩绍宗,“学识才品,当世推重”,官至福建按察副使。韩邦奇从小聪明异常,受其父亲影响很深,青年时期“有志圣学”,且对诗歌音律有独特的见解,凡与他交往的人无不惊叹不已。明正德三年(1508),韩邦奇考中进士,先后任吏部考功主事,又升员外郎、浙江按察司、山西巡抚、南京兵部尚书等职。正德九年(1514),韩邦奇被调任浙江按察司僉事。在任职期间,目睹宦官强征富春江的鱼产与富阳一带的茶叶,愤而作民歌《富春谣》诗云:“富阳江之富,富阳江之茶,鱼肥卖我子,茶香破我家。采茶妇,捕鱼夫,官府拷掠无完肤。富阳山,何日摧,富阳江,何日枯!山摧茶亦死,江枯鱼始无,于我!山难摧,江难枯,我民不可苏!”有人借题发挥,指控其作歌怨谤。武宗皇帝大发雷霆,下诏令其入狱,朝臣营救,后被革职回家。韩邦奇开始了他讲学著书的生涯,四方学者云集门下。在此期间,他写下了《性理三解》、《易占经纬》、《易说》等著作。他还是明朝著名的作曲家和音乐理论家,对声律与乐学成就最高,至今所著的《律吕新书直解》一直被后人推崇。《关学编》称他“文理兼备,象数可与邵康节,论道体乃独取张横渠”。

冯从吾(1556~1627),字仲好,号少墟,长安(今陕西西安)人。著名教育家,以鲠直著称。生而纯懿。有志濂、洛之学,受业于许孚远。登万历进士,授御史,巡视中城,阉人修刺谒,拒不见。旋抗章言帝失德,帝大怒,欲廷杖之,阁臣力解得免。寻告归,杜门谢客,造詣益深。家居二十五年,又起为尚宝卿。累迁工部尚书致仕。卒,谥恭定。学者称少墟先生。著有《冯少墟集》22卷,又有《元儒考略》、《冯子节要》及《古文辑选》,均《四库总目》并行于世。冯从吾居家从事学术著述的同时,也十分热衷于讲学。为了宣传他的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借用西安城南门里的宝庆寺(今西安书院门小学)作为讲学场所。冯从吾的追随者很多,听众竟达几千人,连明王朝的陕西地方官也来听讲。时人评其曰:“出则真御史,直声震天下;退则名大儒,书怀一瓣香”。宝庆寺地窄房小,难以做讲学施教长久之地。万历三十七年(1609),陕西布政使汪可受、按察使李天麟等遵从冯从吾的意愿,在宝庆寺东侧小园拨地,筹建关中书院。三年后,新任布政使汪道亨于书院后部又建“斯道中天阁”,以祀孔子,收藏儒家经

典。后世经不断修葺扩建,到晚清已具相当规模,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一座高等级学府。天启五年(1625)八月,魏忠贤的在陕党羽为迎合魏禁灭东林书院的旨意,派人捣毁关中书院,并将中天阁内供奉的先圣塑像拖出“掷之城隅”。冯从吾见自己呕心沥血经营多年的书院毁于一旦,悲愤成疾,翌年去世。

李二曲(1627~1705),亦名李颀,明清之际哲学家。字中孚,号二曲。陕西周至人。因为“周至”的古字在《汉书》中解释为山曲和水曲。所以人们便称他为“二曲先生”。家贫,借书苦学,遍读经史诸子以及释道之书。曾讲学江南,门徒甚众,后主讲关中书院。与孙奇逢、黄宗羲并称三大儒。清廷屡以博学鸿词征召,以绝食坚拒得免。为学主兼采朱、陆两派,主张兼取其长。重视实学,提倡“明体适用”。同顾炎武反复辩论“体用”问题,提出“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的见解,将“格物致知”的“物”扩充到“礼乐兵刑、赋役农屯”以至“泰西水法”等实用学问。力主自由讲学,与清廷钳制思想政策对立。所著有《四书反身录》、《悔过自新说》、《二曲集》等。据刘光永《关学大师李二曲》一文称李二曲为“一代关学大师”、“海内三大儒之一”,总结他的“学术思想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注重实际,反对空谈。”另外“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带有较显明的接近下层民众的色彩。”在他名声如日中天之时,南下长江流域讲学,“江南名流为了见识二曲先生的学识和风采,纷纷从各地云集而来,‘环拥拱听’,盛况空前。常州学者们仰慕二曲先生的才学,还专门筹集银两修建了一所‘延陵书院’,并高挂二曲先生巨幅肖像作为纪念。”^[3]据《陕西通志》记载,李颀在世时,所传学生、弟子很多,如王心敬、张珥、李士滨、李修、王吉相、宁维垣、王承烈、张骥、孙景烈、李彦幼、贺瑞麟、杨尧阶、杨舜阶等,其中王心敬、李元春、贺瑞麟等编著的《关学续编》,张骥著《关学宗传》等都是宗师的儒学、长安学和关学学说的延续。

李因笃(1632~1692),字子德,一字孔德,号天生,陕西富平东乡(今富平薛镇韩家村)人,自幼聪敏,博学强记,遍读经史诸子,尤谙经学要旨,精于音韵,长于诗词,兼通音律,崇尚实学,为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教育家、音韵学家、诗人。被时人称为不涉仕途的“四布衣”之一。康熙十八年(1679)荐鸿博授检讨。深于经学,诗逼杜甫,尝辨秦中碑版极有依据。行、楷书用笔近颜真卿。著古今韵考、受祺堂

诗文集。《函钵罗室书画过目考》、《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李因笃一生安贫乐道,勤于研读,执教著文,毕生不倦,学识渊博,著述宏富。其主要著作有:《诗说》、《春秋说》、《议小经》、《汉诗音注》5卷,《汉诗评》5卷,《古今韵考》、《受祺堂诗集》35卷,《受祺堂文集》4卷,《受祺堂文集续刻》4卷,手抄本《山汉论》1卷等。李因笃早年就以诗闻名于世,《受祺堂文集》序中称:“其文可追班马,惜为诗掩,其为名流推重,一时海内风行”。顾炎武在《酬李处士因笃》一诗中这样写到:“一朝得李生,词坛出飞将。”可见他在诗歌创作成就上并不亚于经学。李因笃的著作凡54种,而诗集、诗评、诗说就达40余卷。李因笃写诗源于风骚,出于古歌谣、乐府,而杜诗为宗。他很讲究作诗的章法句法,坚持“宁拙毋纤,宁朴毋艳,宁厚毋涩”。《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诗“大抵意气苍茫,才力富赡,而亢厉之气,一往无前,失之粗豪者盖亦时时有之”。李因笃最擅于五言排律、曹溶论诗,把他推为一代之首。他在诗歌研究上也颇有建树,著有《诗说》、《汉诗评》等。李因笃音韵学研究成就突出,为当时权威,一生与顾炎武携手合作,《音学五书》是顾炎武音韵学的主要著作,写稿时,常与因笃商讨,顾炎武赞曰:“深知吾书,海内惟李天生一人。”李因笃还研究了杜甫在七言律诗中使用仄声的规律和特点,得到当时朱彝尊等人的肯定。他著有《汉诗音注》和《古今韵考》。除此之外,李因笃在史学、天文、历法、乐律、书法、绘画、考据学等方面亦有很深的研究,在他的著作里都有精辟之论。李因笃毕生从教,堪称一代宗师。

李柏(1630~1700),字雪木,号太白山人,原陕西勉县人,七世祖徙居眉县,为眉人。父亲李可教,母王氏,生三子,李柏其仲。李柏的父亲李可教颇有文学造诣,喜读陶渊明的诗文,一生未应考出仕,耕读传家。李柏受父亲影响,幼年时,便模仿五柳先生,在书斋前面栽了五棵柳树,并题诗到:“茅屋果然如斗大,诗风月度年华,客来陋巷不知处,五柳柴门第一家。”李柏的青年时代,正值明朝灭亡,满清统治中国,李柏在携家眷隐居太白山中,读书涉猎范围极广,尤其对经、史、子、集等造诣较深。此外,他还对兵书、佛学、黄老之学乃至琴、棋、书、画都有很深的考究。康熙三年(1664),出任眉县知县,在任十年间,为百姓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李柏在隐居期间,常穿着道家服装,云游古迹名山,关中各地名胜古迹。三秦关中多数府县的文武官员、学者、名流都与李柏有深浅不同的交谊。宣统年间,陕西官

吏余坤批复眉县知县收集刊刻他的著作,并指出“关中元气酝厚,代有绝学,典型不坠,端在斯人”。光绪十九年,眉县知县毛鸿仪创修“雪木祠”,亲自为祠堂题写“道继横渠”匾额,以昭贤名,载留史册。李柏的著作收集有文章、记事、传等265篇,诗词359首共5册10卷,全部收集在《榭叶集》之中。

三、关陇地区的文人骚客

翻开中国文学史,查询汉唐以后的文坛,关中、关陇地区并非荒凉、寂寞。中华民族文学的血脉在这里一直未曾中断过。“一方山水养一方人”,中国传统文化在此地培育了许多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在中原地区、西北地区,自宋元至明清时期有许多知名度很高的文人骚客,诸如张铉、张炎、王九思、李梦阳、康海、胡瓚宗、金銮等。是他们以自己的独立思想品格、理论著述与文艺创作传承与发展着关陇显学。

张铉(1153~1221),字功甫,号约斋。秦州(今甘肃天水)人。官宣义郎,以直秘阁通判临安。开禧三年(1207)为司农少卿。他曾与陆游、辛弃疾、姜夔等名士交游酬唱,姜夔在《齐天乐》“词序”中称其“以授歌者,功甫先成,词甚美。”《昭君怨》:“拂晓拿舟东去。细看荷花垂露。红绿总吹香。一般凉。会享人天清福。休把两眉轻蹙。谁道做神仙。戴貂蝉。”甚佳。张铉存词86首,著有《南湖集》、《玉照堂词》等。

张炎(1248~1320),字叔夏,号玉田,又号乐笑翁。宋代大词人。祖籍凤翔成纪(今甘肃天水),寓居临安(今浙江杭州)。文学史上把他和另一著名词人姜夔并称为“姜张”。他与宋末著名词人蒋捷、王沂孙、周密并称“宋末四大家”。宋室南渡后迁至临安(今浙江杭州)。张炎是南宋名将循王张俊的六世孙,其曾祖张铉、祖父张含、父亲张枢都是精晓音律的词家。在官宦世家和文学先祖的影响下,张炎自小就深受艺术熏陶。南宋为元所灭后,被迫漂泊江湖,生活境遇一落千丈。晚年流落于苏杭及金陵一带,生活益穷困潦倒,昔日世家公子竟要靠卖卜为生,终抑郁而亡。他与南宋遗老周密、王沂孙等为词友,有词集《山中白云词》8卷及论集《词源》2卷行世。

王九思(1468~1551),字敬夫,号溪陂,晚年别号碧山翁。郿县(今陕西户县)人,为关中十才子,前七子之一。弘治九年(1496)进士,授翰林院检

讨,递补为吏部员外郎。热心戏曲,自组家班,组台到处演出。曾著《碧山乐府序》记载吟唱古秦腔之事:“一日,客有过予音,善为秦声,乃取而歌之,酒酣,予亦从而和之,其乐洋洋然。手舞足蹈,忘其身之贫而老且朽矣。”王九思作有著名杂剧两种,另一为《中山狼院本》,写中山狼忘恩负义,遭人唾弃之事,开明清单折杂剧之先河。一为《杜子美沽酒游春》,描述诗人杜甫于天宝安史之乱平定之后,重返长安古都,泛舟曲江、钓鱼台,追怀往昔,无限伤感,且典当衣物沽酒,以寄孤愤。

在中国传统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经常出现周期性的文学艺术复古运动,往往打出“礼必周”、“文必汉”、“诗必唐”的旗号,进行中华民族文化的改革,于明清和民国时期也不例外。出生于甘肃庆阳的明代著名文学家李梦阳就积极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以反对虚浮僵死的“台阁体”。与他齐名,亦称“前七子”的何景明在复古模拟的基本立场上持相同的观点。

李梦阳(1473~1530),明代文学家。字天赐,又字献吉,号空同子,庆阳安化县(今甘肃省庆城县)人。出身寒微。曾祖父赘于王氏,父恢复李姓。明弘治六年(1493)举陕西乡试第一年中进士。因连丧父母,在家守制。直到弘治十一年,出任户部主事,后迁郎中。弘治十八年四月,因弹劾“势如翼虎”的张鹤令,被囚于锦衣狱,不久宥出,罚俸三个月。正德元年(1506),因替尚书韩文写弹劾刘瑾奏章,被谪山西布政司经历,不久又因他事下狱,赖康海说情得释。刘瑾败,复起任原官,迁江西提学副使。后因替朱宸濠写《阳春书院记》而削籍。李梦阳三起三落的仕宦生涯颇具传奇色彩。他主张古诗学魏晋,近体学盛唐。弘治进士,曾任户部郎中。其文学主张,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反对虚浮的“台阁体”,并认为“真诗在民间。”号称“前七子”。他的文学创作,题材、体裁较为广博,诗歌、散文、辞赋均有佳作。王维禎评价:“七言律自杜甫以后,善用顿挫插搯之法惟梦阳一人。”李梦阳作品流传至今有66卷,有明万历刊本《空同集》存世。

康海(1475~1540),明文学家,戏曲作家。字德涵,号对山。武功(今陕西西安西北)人。弘治十五年状元,任翰林院修撰。为“前七子”之一。作有战国时期中山国人曾故事的杂剧《东郭先生误救中山狼》以及根据当时周至著名艺人王兰卿和张附翱的真挚爱情故事而写成的《王兰卿贞烈传》。另作有散曲《升东乐府》,诗文集《对山集》,笔记小说《纳

凉余兴》、《春游余录》、《即景全录》等。他除了编剧著文,绘制秦腔脸谱。还擅长弹奏琵琶,人称“琵琶圣手”,并在民间秦声基础之上创立“康王腔”。广集乐工,家蓄菱僮,自建家班,组织秋神报赛,积极推进民间戏曲活动。晚年被被誉为“绝艺”。

胡瓚宗(1480~1560),字孝思,号可泉。巩昌府秦州(今甘肃秦安)人。正德三年(1508)进士,特授翰林院检讨。历任山东布政使司左参政、河南巡抚右副都御史等职。他一生辛勤写作,著述甚丰,创作以诗文为主。著有《鸟鼠山人集》、《拟涯翁拟古乐府》、《愿学编》、《巩郡记》、《礼仪集注》、《春秋集传》、《读子录》等。

金銮(1506~1595),一生不求功名,以布衣终身。著名诗人、散曲家。字在衡,号白屿,陇西(今甘肃东南)人。万历年间侨寓南京。性任侠,喜交游。往来淮扬两浙,与盛时泰、吴怀梅诸人交谊颇笃。解音律,善填词,好作嘲调小曲,有箫爽斋乐府二卷。又尝取古词,辩其字句清浊为一书,为后人所宗。通音律,善作散曲。钱谦益在《列朝诗集》中评述他“诗不操秦声,风流宛转,得江左清华之致。”所作散曲,名重一时。金銮诗今存213首,存散曲计小令134首,套数24首。其散曲成就在诗之上。何良俊在《曲论》中说:“南都自徐髯仙后,惟金在衡銮最为知音,善填词。其嘲调小曲极妙,每诵一篇,令人绝倒。”王世贞《曲藻》亦云:其作“颇为当家,为北里所贵。”今存有《徙倚轩集》、《箫爽斋乐府》、《金白屿集》等。

另如陕西大荔县的李元春,渭南县的贺瑞麟等都在发扬关学、儒学方面作出自己重要的贡献。富有成就和代表性的还有邢澍、李南晖、牛树梅、张澍等。其中堪称佼佼者的李元春(1769~1854),朝邑(今大荔)人,字仲仁,号时斋。人称桐阁先生。一生贫而乐道,著述甚丰。包括经、史、诸子论说、理学、文学、经世实学等诸类。《中国丛书综录·子目》收录他的著作48种。《桐阁全书》收入24种,共201卷。《青照堂丛书》收入他的著述11种,共30卷。甘肃武威人张澍(1776~1847),字介侯。曾在陕西武功任知县。亦为著名经学、史学家、金石学家。他受宋代大儒张载的学术思想影响,撰写过大量被《清史稿·文苑列传》称为“绝学”的理论著述。诸如包括《姓韵》、《辽金元三代》、《西夏姓氏录》等在内的《姓氏五书》;《蜀典》、《续黔书》、《五凉旧闻》、《凉州府志备考》等方志;还有《养素堂文集》、《三辅旧事》、《三辅故事》、《二酉堂丛书》、《说文引

经考证》、《秦音》、《万物权舆》等著作。其中《三辅旧事》、《三辅故事》是他广泛搜求《三辅黄图》、《艺文类聚》、《长安志》、《太平御览》、《北堂书钞》等古籍,编纂辑成的有关秦汉长安古都宫室、桥梁、道路、池苑,以及流传的轶闻、掌故的史料书籍。《二酉堂丛书》又名《张氏丛书》,共 21 种,27 卷。所辑收秦地、关陇地区,上自周、秦,下至隋、唐时代,陕西、甘肃各地古代历史地理文化方面的轶本,对后人了解、研究长安学大有裨益。

清代自 1644 年统一全国各地,重新建立中央集权统治政权之后,经上百年的拓疆扩充与经营,遂将辽阔广袤的西北地区纳入中华帝国的版图之中,亦在上述区域逐步恢复以长安文化为核心,关学为主导的华夏民族文学艺术的教育和影响。清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顾炎武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音韵训诂,尤为经学考据、边疆史地方面深有学术造诣。借助渊博的古代文化知识与科学方法开创了清初朴学风气,对后世学术研究影响颇大。到了著名散文家刘大櫆时,竭力主张著文模仿汉唐古人的“神气”、“音节”、“字句”等,更为当时的拟古写作和关学、儒学思想普及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关学在近现代的发展

在清军尚未入关之前,以李自成成为首的大顺农民政权已在开拓西北疆土方面做过大量的工作与努力。发端与明天启七年(1627)陕西北部河套地区一带的农民起义军,经过多年艰苦卓绝的战斗,于崇祯十七年(1644)取得了对整个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地区的控制权。并与当年正月初一在西安正式建立大顺政权,改元永昌。大顺二年三月,“新顺王”李自成率军抵达北京,逼死崇祯皇帝,建国达 276 年之久的明朝宣告灭亡。清军在南下夺取大顺农民政权之后,派兵赴西域陆续平定准噶尔噶尔丹、达瓦齐、阿睦尔撒纳、大小和卓、张格尔叛乱,逐步统一了天山南北。

据谷苞主编的《西北通史》记载:“此后,清朝政府开始逐步在阿尔泰、萨彦岭、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与帕米尔的广大地区,以及天山南北,设立各级行政机构。整个西北边疆被划分为两大行政区:北部,即额尔齐斯河、斋桑泊以北、阿尔泰、萨彦岭地区,属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管辖;南部,包括天山南北、巴尔喀什湖以南至帕米尔地区,属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管辖。”^[5]

多民族的大一统中国封建清王朝建立,经顺治、康熙、乾隆等几代皇帝的努力,国势日益强盛,边境更加巩固。以西安为轴心的西北地区约占当时整个国土面积三分之一。它东起潼关,西抵帕米尔高原和巴尔喀什湖以东地区,南与四川、西藏交界,北达中亚地区的唐努乌梁海,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陕西地理位置,不仅是通往西北诸省的咽喉,还是东通晋、豫,南连川、鄂地区的门户。清王朝为了加强和巩固对大西北的统治,首先于康熙元年(1662)在西安设立陕西驻防将军,以统八旗各部。又在关中地区专设承宣布政使司,及其陕甘总督与巡抚。雍正六年(1727)下设陕西西安布政使、按察使和陕西甘肃布政使、按察使,以分管各地。在长治久安、国富民强的相对社会和谐清朝,入关的满族统治者渐渐融化到汉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潮流之中,特别是从脉脉相承的长安周秦汉唐文化中汲取丰富的营养。

于清同治五年(1866),陕甘总督左宗棠被加授钦差大使印,督办陕甘军务。于西北所见“师行所至,觐设汉、回义塾,分司训课。”^[6]在他和当地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下,西北地区修复和兴办了许多专修四书五经与国学的高等书院、科举应试场所。

据有关文献记载:“从同治八年(1869)至光绪六年(1880),在西北新修的书院有:尊经书院(庄浪)、泾干学舍(泾阳)、味经书院(泾阳)、文明书院(岷州)、襄武书院(陇西)、钟灵书院(宁灵)、金山书院(洪水堡)、归儒书院(化平川,特为回民所设)、南华书院(甘州)、河阴书院(贵德)、陇南书院(秦州)、庆兴书院(董志原)、五峰书院(西宁)、湟中书院(西宁)、文社书院(镇番)、鹤峰学社(三岔镇)、凤池书院(惠安堡)、柳湖书院(平凉)等;在甘肃先后重建、修复的书院有仰止书院(东乐)、瀛州书院(泾阳)、鹑觚书院(灵台)、银川书院(宁夏)、河阳书院(静宁)、凤鸣书院(崇信)、鸣沙书院(敦煌)等十所。”^[5]

在陕西关中和甘肃陇右的清代文人中,始终有一批忠实于本土周秦汉唐传统文化的卫道士。诸如关中郃阳(今陕西合阳)人李灌、宝鸡人党崇雅、淳化人宋振麟、蒲城人屈復、崔向余、三原人张鼎望、周元鼎、宜川人张梓、城固人何炯若、渭南人张元中、郭安康等既写诗著文,又编撰理论著述,为弘扬该区域古今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诸如屈復(1668~?)清文学家。字见心,号悔翁、金粟道人。蒲城(今陕西蒲城东北)人。博学多才,富诗鸿词。有《楚辞新

注》、《玉溪生诗意》、《弱水集》等。

被誉为清初文坛“四杰”的吴镇、胡赞宗、杨子安、刘绍攸,均为著名的陇右学人。刘绍攸《二南遗音》记载了从清初至乾隆年间一百四十位秦陇诗人,其中不乏遐邇闻名的文学巨匠,如李楷、李柏、李颙、王建常、李因笃、孙枝蔚、李念慈、韩诗、王又旦、康乃心、屈复、杨鸾、吴镇等。其中的杰出者吴镇(1721~1797),字信辰,号松崖。甘肃会宁人。曾任陕西耀州学正,韩城教谕。诗作古雅、深奥、奇博,当时在国内很有影响。诗文收入《松花庵全集》中。同期富有名声的还有著名学者邢澍,他在学术研究之余,亦有大量诗文,多收入《南旋诗草》一书之中。

王筠(1749~1832),清代中叶著名女诗人兼剧作家,长安(今陕西西安市)人。字松坪,号绿窗女史。出生于书香门第。在官至翰林院翰林父亲王元常的培育下,十三四岁时就能吟诗填词谱曲。现存诗词二百余首,结集为《槐庆堂集》,作有传奇三部,即《繁华梦》、《全福记》、《会仙记》。《繁华梦》写妙龄少女王梦麟游园做梦,变为一个美男子,享尽荣华富贵,梦醒色空,被麻姑点化为仙。其父为此作序云:“每以身列巾幗为恨,因撰《繁华梦》一剧,以自抒其胸臆。”《会仙记》为此剧之后续姊妹篇。《全福记》则写文彦作为才女的叱咤风云的一生,也在形象地寄托作者的美好理想。

张澍,生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卒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清代著名学者,凉州府武威县(今武威市)人。一生著述颇丰。清代著名学者张之洞《书目答问》将其列入经学家、史学家和金石学家。

任其昌(1831~1901),甘肃秦州(天水)人,进士出身,曾任户部主事等职,在西北各地办书院与讲学长达 28 年。著有《敦素堂诗集》、《敦素堂文集》等书。代表诗文如《流民叹》、《游麦积山记》、《秦安道中》、《游石门记》等。生于清宣宗道光十一年,卒于德宗光绪二十六年,年七十岁。同治四年(1865)进士,授户部主事。十二年,以母老乞养归。闭门教授。主天水、陇南各书院,垂三十年。性至孝,见义勇为。十七年,以总督杨昌濬疏荐,诏加员外郎衔。后因闻拳匪倡乱,悲愤疾作卒。其昌天姿高迈,博闻强识,覃精三礼之学,尤长于考订史事;所为古文,风力雅近宋人;晚年肆力于诗,宗法少陵。著年末四十,告归故里,先后主讲天水书院、陇南书院三十年,其门下英才辈出,有名者如清光绪时内阁学士、工部侍郎刘永亨、礼部主事丁秉乾、回族名翰林哈锐、刑部主事杨润身等人。著有《敦素堂诗文集》、《秦州

新志》等 6 部。一生痴情教育,忧国忧民,自挽诗云:“飞雨流云过此生,有情何似总无情。可怜耿耿胸中血,埋血青山作五兵。”。

王权(1822~1905),早年于关中、天水等地四所书院讲学,历任教谕、知县等,曾撰写有《笠云山房文集》十二卷、《笠云山房诗集》四卷。钱仲联在《道咸诗坛点将录》中高度评价其“著作宏富,近代陇右人无过之者。”

刘古愚(1843~1903),教育家。名光蕡,字焕堂,号古愚。咸阳天阁村(陕西咸阳市秦都区)人。毕生从事教育事业。先后任教于西安、三原、泾阳等地,曾出任味经书院山长、崇实书院院长。他主张教育救国,重视学用结合,将算学列为必修课程。1895 年后,响应康梁变法,积极宣传西学,时有“南康(有为)北刘(古愚)”之称。刘古愚晚年主讲烟霞草堂,又移教甘肃大学堂任总教习。著有《五经臆解》、《大学古义》、《史记货殖列传注》、《前汉书食货注》等。后人辑为《烟霞草堂文集》等。

被誉为“陇上铁汉”的安维峻(1854~1925)历任都察院监察御史、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自辞归乡里后,一心著述立说,编写有《望云山房诗文集》,其中《请诛李鸿章书》堪称政论名篇。

刘尔忻(1865~1931),近代著名学者。字又宽,号果斋、五泉山人。甘肃兰州人。光绪乙丑科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应聘为五泉书院讲席。曾官至翰林院编修,历任甘肃文高等学堂总教习、甘肃临时参议会副议长。他一生热心于陇右的文化教育和公益事业,并主讲于五泉书院。撰写有《果斋前集》、《果斋续集》等多部文论作品。尤擅长诗歌、楹联等文学作品。

清朝后期,陇右著名诗人还有秦州(今甘肃天水)的任其昌、甘肃秦安的安维峻等。清末民初,西北关陇地区的文人骚客,积极融入反抗清朝封建统治政权的斗争中,后又加入如火如荼的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潮流之中。辛亥革命前后,留日陇右籍学生杨思、范振绪、阎士麟、万宝成等先后创办《秦陇》、《关陇》、《夏声》等革命刊物。在京西北籍大学生王和生、张继忠、邓春兰等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如出生于充满开明思想家庭的邓春兰为了实现她的男女平等、自由民主的女性解放计划,专事寄信于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建议男女同校书》,并联络 6 位女子乘羊皮筏子漂流至黄河,离开兰州赴京求学,以实际行动促成此事。遂受到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著名学者的支持与呼

应,如愿以偿成为首批男女合校的女生。

李桐轩(1860~1932),名良才,字桐轩,号莲舌居士,陕西蒲城人。清末贡生,他肄业于三原宏道书院。1905年参加陕西同盟会,民国后被聘为陕西修史局总纂、省长署顾问,全国语音统一会会员。同盟会会员。历任陕西省咨政局副议长、省政府顾问等职。1912年与孙仁玉在西安共同创办陕西易俗伶学社,发起创立易俗社,被推选为第一任社长。他创作编演秦腔剧目30余种。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戴宝珉》、《一字狱》等,撰写研究秦腔传统剧目的学术专著《甄别旧戏草》。

孙仁玉(1872~1934),名瑗,字仁玉。陕西临潼人。易俗社创始人之一。历任陕西省修史局修撰、易俗社社长等职。一生编创大小剧作160余种。如《柜中缘》、《三回头》、《将相和》、《镇台念书》、《看女》、《白先生看病》等都是20世纪盛演不衰的优秀剧目。

范紫东(1878~1954),名凝绩,字紫东。陕西乾县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光绪二十九年(1903)入陕西三原宏道高等学堂学习。历任易俗社编辑、武功县知事、西安文史馆馆长等职。一生编创各种剧作70余部。汇编为《待雨楼戏曲集》,内收其代表作如《软玉屏》,写白妙香女扮男装赴京应试,及第状元后,明察暗访,清理数桩冤案,为奴婢伸张正义。大型秦腔《三滴血》演绎知县晋信书的迷信书本,滴血认亲,造成几家父子分离、夫妻离散的人生悲剧。该剧数十年演出不断,享誉神州,堪称戏曲经典。他于1902年考入陕西省三原宏道高等学堂,以优等第一名毕业。1910年后在西安府中学任教,并任健本学校校长兼教员,同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被选为陕西省第一届议会议员。1912年,范紫东与李桐轩、孙仁玉等发起创办易俗社,先后任编辑主任、评议长等职。在40年的时间里,他共创作了题材广泛、思想进步、主题深刻、人物鲜明的大小68个剧本,《春闺考试》、《金莲痛史》、《八字案》、《战袍缘》、《大学衍义》、《翰墨缘》、《女儿经》、《玉镜台》、《苏武牧羊》、《三知己》、《光复汉业》、《鸳鸯阵》、《盗虎符》、《伉俪会师》、《秦襄公》、《晋文公》、《李广射虎》等是其中的代表作。范紫东爱好广泛,饱学多才,他除了在戏曲创作上有突出的成就外,还在语言、金石、历史、地理等研究领域有不少建树,著有《关西方言钩沉》、《乐学通论》、《关西周秦石刻摹本》、《地球运转之研究》、《乾县县志》、《永寿县志》等著述。

高培支(1881~1960),名树基,字培支,号悟皆。陕西富平人。清末拔贡。毕业于陕西三原宏道高等学堂,历任陕西省图书馆馆长、易俗社编辑主任、评议长、社长,编写剧本四十余部,以家庭戏和社会戏文明于世,较有影响的剧目如《夺锦楼》、《人月圆》、《鸦片战纪》等。

一生以法政、教育为业,曾历任甘肃省临时议会议长、参议院参政、甘肃文学院教授的慕寿祺(1875-1948),著述等身,如《甘宁青史略》、《求是斋诗话》、《求是斋诗钞》等数十种。安维峻评价他的古近体诗“无美不备,意到笔随,自成一家。”^[7]倾心实业救国的邓隆(1884~1938)热衷文学创作,他写有《壶庐诗集》4卷、《拙园文存》4卷等数十种。

吴宓(1894~1978),原名玉衡,又名陀曼。字雨僧。陕西泾阳蒋路乡安吴堡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奠基人,著名文学评论家、教育家、诗人。光绪三十四年(1908)入清华学堂。后赴美留学,就读哈佛大学。回国后在东南大学、东北大学、四川大学、清华研究院等地任教。有《吴宓诗集》行世。创办《陕西杂志》,担任《学衡》主编。作传奇《陕西梦》,另根据美国郎法罗长诗《红豆怨史》改编戏文《沧桑艳》。他曾著有《吴宓诗文集》、《空轩诗话》等专著。

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因中原地区的大批文人学者对西北地区的社会调查与研究,而涌现出许多人名篇,根据丁帆主编的《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中记载:“这一时期的西行考察游记作品主要有:谢彬的《新疆游记》、陈万里的《西行日记》、心道法师的《游敦煌日记》、林鹏侠的《西北行》、裴景福的《河海昆仑行》、徐炳旭的《西游日记》、陈赓雅的《西北视察记》、程先甲的《游陇丛记》、明驼的《河西见闻录》、李德贻的《北草地视察记》、顾颉刚的《西北考察记》、宣侠父的《西北远征记》、庄泽宣的《西北视察记》、冯有珍的《新疆视察记》、黄汲清的《天山之麓》、吴蔼宸的《新疆记游》、陈澄之的《伊犁烟云录》、马鹤天的《甘青藏边区考察记》、萨空了的《由香港到新疆》、杜重远的《盛世才与新新疆》和《三渡天山》、天涯游子的‘人在天涯’系列《西行记》、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茅盾的《白杨礼赞》等。另外,还有一批作家、文化人士、官员在此间客居西部,均留下了大量的诗文作品,如俞明震、高旭、于右任、高一涵、罗家伦、唐祈、王洛宾等。”^[8]

值得重视的是谢彬撰写的考察游记《新疆游记》,曾由孙中山先生写序,并从中披露出此位伟人意在开发大西北的计划。另外,还有国民党时期监

察院院长于右任,这位来自陕西三原的诗人、书法家一生写过大量诗词歌赋,不少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瑰宝。

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曾来西安讲学时题写过“古调独弹”的牌匾的著名戏曲班社——“易俗社”培养过许多有造诣的文学艺术家。对此民间社班历史的回顾非常有助于我们对长安文化薪火后传的认识。自明清以来,西安就组织和活跃着众多的秦腔班社,其中富有代表性的明代张家班、华庆班,清代保符班、江东班、双赛班、泰来班、玉盛班、金盛班、双翠班、福盛班、华清班、明盛班、玉成班等。相比之下,当然于要数明末清初,集诸班技艺精华之大成者的“易俗伶学社”或“陕西易俗社”,最有名气和声势。此著名戏曲班社不仅培养演员,还孕育了大批剧作家和优秀文学作品。它可说是关陇传统文化的延续,亦为长安文学艺术的形象缩影。

参考文献:

- [1] 王晶波. 晋唐陇右小说[J]. 中国典籍与文化, 1994 (4): 61-66.
- [2] 乔力. 中国文化经典要义全书[C]//吕大临. 横渠先生形状.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6: 483.
- [3] 张铭治. 长安史话[M]. 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 2001.
- [4] 崔钟雷. 诗品人间词话[M].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 2007.
- [5] 谷苞. 西北通史:第4卷[M].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5.
- [6] 左宗棠. 左宗棠全集·札件[M]. 长沙:岳麓书社, 1986.
- [7] 王干一, 路志霄. 陇右近代诗钞[M].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1988.
- [8] 丁帆. 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Discussion for carrying the torch of Guan-Long scholars

LI Q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Shaanxi, China)

Abstract: Guan-Long refers to Guanzhong area in the central part of Shaanxi and Longyou area in the east part of Gansu. This area is one of the birthplaces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also the important place where the northern scholars in China were centered around and more cultural achievements were produced. In the ancient time, the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in China and Buddhism, Manicheism, Islamism and Catholicism from the west were converged, forming Chang'an culture. The Guan learning,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northern science school, and Chengzhu science school came together, becoming influential academic community in philosophy, ideology, religion, literature and art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e life experience of Guan-Long scholars and their cultural achievements, find out and sort out their related documents, which can greatly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and creation for China's west culture.

Key words: Guanzhong; Longyou; Guan learning; Chang'an learning